

90 年前國際聯盟《中國教育之改進》我見

單維彰

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臺灣教育評論學會會員

民國 21 年底，國立編譯館出版了《中國教育之改進》，至今將滿 90 年。作者認為它的價值不僅是史料，其部份改進建議至今仍然值得我輩研究。本文先簡述此意見書的背景，然後以其三點意見為例，夾附作者的詮釋，佐證此書仍有值得注意的議題。

一、背景簡述

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 1920-46；以下簡稱國聯）在西元 1931 年受國民政府之請，決議由國際文化合作社（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委派一考察團到中國，其任務為：「研究國家教育之現況，及中國古代文明所特有之傳統文化；並準備建議最適宜之方案」（吳相湘編，1963，頁 1；以下所有引文皆出自此書，故此後僅注頁碼）。

此考察團由柏林大學教授、前普魯士教育部長柏克（Carl H. Becker），波蘭教育部初等教育司長法爾斯嘉（M. Falski），法蘭西公學院物理教授朗吉梵（Paul Langevin），以及倫敦大學政治經濟教授叨尼（R. H. Tawney）組成，由兩位行政官員領團：國聯秘書室主任（Frank P. Walters）以及國際文化合作社社長（Henri Bonnet，後來成為法國戰後第一任駐美大使）。該團於 1931 年 9 至 12 月在中國各地考察，返回南京之後先呈一份簡報，返歐之後以英文出版報告書（Becker, Falski, Langevin, & Tawney, 1932），教育部責成編譯館將其中譯，即是《中國教育之改進》；此書為編譯館自 1932 年 6 月成立以來的第一冊出版品¹。

國民政府相當重視考察團的意見，在 1933 年 1 月上旬即召開第一次討論會議，與會者包括蔡元培、吳稚暉、朱家驊等人，並組成六人「訪歐教育考察團」於當年 8 月回訪歐洲八國。這些經驗對「南京十年」教育施政發揮的影響（它們大多帶來了臺灣），如今是歷史的研究題材，例如李凱一在全球教育史的架構下細究國聯帶給南京政府的影響（Li, 2021），張力（2012）在國際合作的架構下考察國聯對中國的影響，這兩本專書都對考察團在中國、歐洲、美國引起的辯論有細緻的記述；張學強（2017）特別關注考察團對中等教育的影響，孫邦華（2013）

¹ 綜合《申報》1932 年 12 月 20 日、1933 年 1 月 19 日與 10 月 21 日、1934 年 10 月 10 日報導。事實上，此考察團正式遞交報告的官方單位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籌備處」，教育部譯出全文之後，先由該委員會在 1932 年 12 月 16 日印 200 冊分發各相關單位，然後才由編譯館於 12 月 31 日出版發售。

則評述了當年引起的中國現代教育的歐化與美化之爭。

但是本文並不擬討論歷史，而是想要指出：時隔 90 年，國聯教育考察團提出的一些現象，如今看似依然存在，仍然值得吾輩省視與研究。以下提出三則範例，就教於學界同仁。

二、教育應從固有文化中新生

作者認為考察團懷抱的信念是「一民族之智能與其在文化上之表現，其間有一種自然之關係」（頁 14），以及「人類決不能因其不顧過去，遂能超越過去」（頁 128）。因此，他們認為中國之教育「斷不可在求中國之美化或歐化，而在求中國固有之民族特性與歷史特性之維新耳。」（頁 15）。又因為：

外人不能告中國人，在中國舊有文化中，究竟何者應為此種教育制度之基礎，何種要素為組成中國自然的文化所必需，此非由中國人自己發現不可也。（頁 108）

所以整體而言，作者認為這份報告書所秉持的核心思想是：

新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並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及一切真屬固有之國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此種文明，非美非歐，而為中國之特產也。（頁 20）

圍繞著這個核心思想所提的各項建議，是作者所謂「最本質的意見」。他們反覆申論，一則希望中國的教育能從中國本身的文化脈絡中演化而出，二則希望中國能真正體會與欣賞西方思想變化的精神。從清末算起，中國教育制度的大規模「現代化」可謂三十年有成。但考察團指出那些「進步」僅為機關與制度的「可對應」，跟本質上的「相等」還有段距離：

中國人對於其教育機關與西方近代文化先進各國所有者相似，頗有自豪之表示。惟希望其自豪之心，不致將此種外形上淺顯之類似，與其內在性之真正相等混為一談，則幸矣。如歐美影響之一切痕跡不予祛除，中國之教育決不能得到西方教育之價值，且不能成為真正之中國教育，而與歐美教育之特色相比擬也。（頁 19）

國聯的專家學者估計，如果中國教育部及大學在當時就停止「宣傳各種可讚美之空論」，而開始「化原理為實際」，大約再三十年可以蛻變出中國自己的教育（頁 207）。但是——不論願不願意按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中國並沒有那 30 年。一

則國民政府實際能推行政策的地區並不大，各地本來就沒有靜心思考教育問題的餘裕，二則這份報告書發表之後沒多久就爆發了大規模戰爭。

就臺灣而言，連年戰禍之後，首先休養生息，然後拼經濟，接著熱中於政治，直到最近，才開始有臺灣學者自發地想要從中國文化的脈絡與西方思想的本質中，重新探索屬於自己的教育理念。其中一支隊伍是徐式寬教授召集的跨領域研究團隊。他們已經出版徐式寬和吳毓瑩主編的專書（Hsu & Wu, eds, 2015），徐式寬（2018）以及張錚焜（2021）也開始發表成果。

三、過度傾美的商榷

考察團對於中國傾向美國的程度表示驚訝：

...對於美國在中國教育上過分之影響所造成顯著之結果—即使不謂其為驚人之結果—實有加以特別注意之必要。（頁 15）

別忘了這個考察團全由歐洲人組成，況且在那個經濟大蕭條的時代，歐洲知識分子即使承認美國的經濟／貨幣影響力，在文化上還不怎麼瞧得起美國。所以，代表了歐洲四種文化的國聯考察團對美國特別有意見，多少有其私心的成分。但是勿因人廢言，他們的意見還是值得看看。

作者認為當時中國傾向美國的原因有三：

1.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準確的轉捩點待考），美國人（教會或俗世）在中國建立的學校數量超過了英國人所建。考察團也說「中國之中等學校，由外人創辦者甚多—特別以美人為甚。」（頁 13）
2. 美國運用庚款建立清華學堂與資助留學之策略，確實收到極大的效果。
3. 中國政府與知識分子可能認為就國土之面積、人民之數量來看，美國才是中國的同儕。

當然美國也確實有人，例如杜威、孟祿等，真的值得學習。可是，考察團指出：

極多中國青年知識分子，徒摩倣美國生活之外形，而不知美國主義係導源於美國特有之情狀，其與中國所流行之情狀完全不同。（頁 14）

如何不同？美國有地主鄉紳，但沒有世襲的貴族；美國人沒有共同的歷史文

化，他們面對的文化問題是融合與創新，而不是演化與蛻變。考察團裡的歐洲人想要說服中國同儕：中國的情狀其實與歐洲類似。但是在概念上不要以中國比歐洲任一國，而要以中國比歐洲、以中國各省比歐洲各國（其實中國已有人提出此見）；而在時間上，不是與十九世紀的歐洲比較，而要與文藝復興或新教抗議時代的歐洲相比。針對教育，他們說：

迄文藝復興時止，歐洲對於教育之觀念，實與三十年前中國之教育觀念同，純受社會上宗教上種種成見之支配。所謂教育，不過藉經典上之知識，養成一種知識階級，在政治上與宗教上作群眾之指導而已。而群眾所受之教育，不過為口頭之傳授；出自口頭傳授之農工作業，其所需要之專門知識甚為簡單，固無須經院為之準備也。此種狀況之本身固甚穩定，然有一種最有力之新因素能促其變動，即由實驗科學所產生之種種專門技術之迅速發展是也。前此人類智力上之活動，均傾向於研究人與人或人與神之關係，甚或從事空洞之玄想，至是始以懷疑之態度研究自然界之現象。（頁 21）

簡而言之，是精神意識的覺醒領導著經濟與政治的改變，而實驗科學為此方向的改變提供了決定性的動力。

除了社會情狀不成比例以外，考察團對於成形於美國的教育「學科」頗不以為然，濃縮成一句話就是「教育學在美國竟成為自然科學之一」。他們影射美國人致力於實驗科學的猛進，對於抽象科學（包括歷史與哲學）則相對認識較淺，因為美國「沒有歷史」，而且「哲學在美國之意義，與在歐洲亞洲之意義完全不同。」（頁 128）

歐洲人認為教育學（還有醫學）不是獨立學科（academic discipline），而是綜合性而且強調操作經驗之累積的學門或領域（academic field）。關於教育的研究，他們習慣說 studies 而不是 research。他們認為：

在美國 ... 教育自成一獨立之課程，事實上自成一科學，內包含心理學、社會學、教授法、學校管理、衛生等等。（頁 126）

那是二戰之前的歐洲看法。二戰之後，美國以其經濟力統治了半個世界（包括歐洲）。如今，從臺灣的視角來看，前面的美式教育科學應該是「本該如此」的常態了。歐洲各國文化裡的教育，還能不能走自己的路？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法國的數學教育有教育工程論（l'ingénierie didactique 或所謂 EE: Educational Engineering）。至於英國，因為 field 被認為比 discipline 次等，為了尊嚴和經費競爭這雙方面的理由，他們爭取成為 discipline。

雖然考察團讚許了哥倫比亞、芝加哥兩處師範教育的成就，但他們認為那樣培育出來的教師：

諳熟教育學所包含之一切學問，而對於課程表所列之科目，則無一專長...「知道如何教授自己所不知之科目」... 關於兒童的科學實已有迅速的進步；但兒童教育之本身，卻反因此陷入危途。（頁 126）

如今，臺灣的中等教育師資應該沒有上述問題，但是在普通教育方面的知識（包括評量原理）卻可能不足。作者認為這個現象肇因於：教育領域從 field 轉向 discipline 的過程中，重視「反覆實作之經驗累積」的理念逐漸流失了。前面曾並論教學和醫學，醫師生涯中有持續的進修活動，在大型醫院中也有與職等相關的評鑑，反觀教師生涯，則終身學習之機會與需求，還有很大可改進的空間。

將教育「科學化」的關鍵態度之一就是對「精確測量」的需求：所有實驗科學（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共同特徵就是以測量為基石。因此，美國教育學界的測評理論與標準化測驗就席捲了世界。跟著標準化測驗而來的就是量化的學習「績效」：具體而言就是學分。在大學階段特別明顯：學位的授予被「化約」成學分的累積，久而久之，那些在學分與學分之間、課程與課程之間串起整個學習的「動機與目的」，全都不被在意了——因為它們不能被測量而成數據。早在民國 20 年，我國的教育就已經走上了這條路：

...華人對於「測驗」之效果及「學分制」實際之長處，其讚賞之心，不應使其尊重教授法過甚，而忽視教學上之別種學科也。〔作者按：這裡要說的應該不是教授法，而是「考科」吧：不應尊重考科過甚。〕（頁 127）

華人對於「測驗」的讚賞之心很可能並不是向美國學習的結果，而是華人的「科舉」遺緒，使得華人對考試的崇拜與美人對標準化測驗的熱愛一拍即合。

考察團似乎有自知之明，他們言盡於此，也只能這樣了：

〔教育〕整一性之如何重要，在具有悠久文化之中國民族，當不待他人饒舌而始知之也。...外人對此所能為力者，亦祇喚起注意，使中國人知其需要一種〔教育制度〕，自成一完善之整體而已。（頁 108）

但他們仍將此項意見視為核心，因此，在結論與建議（共五頁）列出的五項「急需之初步方案」中，就有一項「中國應派遣專家前往歐洲研究教本，課程等等」（頁 222）。如今，我國的比較教育研究對於歐洲的學制與教育理念具有較豐富的文獻，但是在學科教材與評量方面的考察，仍然感到相對稀少。

四、外語學習與雙語教學的忠告

很奇妙地，這本 90 年前出版的書，恰好就對「英語學習」以及「雙語教學」——特別是自然科學的雙語教學——提出了建議。看來，這份「直接以外語當作外來科技之教學語言」的懸念，可能已經纏繞我們超過一個世紀了。

在中等學校之階段中，〔少年〕之語言尚未完全成熟，一切應用外國語言教授之科學，在〔少年〕心目中，必多隔膜。為謀科學頭腦與科學方法之深入起見——此種深入，在中國殊屬必要——則一切皆須從中國語言之課本得來，乃為一種急切不可少之方法。（頁 29）

至於外國語文——特別是英文——的教育，這個考察團所提的現象，今天看來仍然屬實：

關於國文教學，吾人當然不能贊一辭。但對於外國文之教學，則吾人覺有多少應加改良之處。假如吾人所得之證據與印象並無錯誤，則中學生約費六分之一之時間以學英文，六年之後，學業告終，尚多不能參考各種課程中應閱之英文書籍，多未讀過幾冊值得一讀之英文書本。（頁 119）

因此，他們所提的忠告，今天讀來也還是有當頭棒喝之感；簡單說，就是別把「發音」和「會話」這兩種英語學習目標混為一談；我國學生普遍需要學習的是英語發音而不是英語會話，為達此目標，適當的教學法是「朗讀」而不是「對話」。他們甚至認為，區分這兩種不同的教育目標，則外語學習的困境就可望解除了：

學生應學作簡明之英文，並練習參考英文書籍。現在中學所以不能完全做到此點者，一部份或由於有兩個目的之互相混淆：其一為欲取得英文為工具，換言之，即欲求得閱讀良好英文書籍之能力。其一為欲善操英語。...第一種目的似應為一切學生所必需；而欲達此點，並不須嫻於英語。...第二目的為志願專精英文者所必具；...吾人以為（雖吾人不敢明白確定），苟此二種目的，得有明確之區分，則學生程度即可以提高。（頁 120）

五、結語

希望前面的節錄與闡述，能使讀者同意：這本 90 年前的意見書，如今還有可讀可議之處。此書實際內容僅有 213 頁，分兩大部份：通論 69 頁、各論 144 頁，後者主要分成三個教育階段：小學 28 頁、中學 49 頁、大學 58 頁，各階段皆有至今仍然值得研討的議題。作者已將此書全文掃描，公開於網路，歡迎

各界採用。

參考文獻

- 吳相湘編（1963）。**中國教育之改進**。臺北市：文星書店。2022年4月15日取自 <http://shann.idv.tw/edu/edu1932.html>
- 孫邦華（2013）。中國教育現代化運動中的中國化與美國化、歐洲化之爭。**教育研究**，**402**，116-127。
- 徐式寬（2018）。中國文化下的教育之省思。**清華教育學報**，**35(1)**，71-83。
- 張力（2012）。**國際合作在中國**。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學強（2017）。1930年代國聯教育考察團對民國中等教育改進的影響。**西北師範大學教育學報**，**12**，244-251。
- 張鎰焜（2021）。朱子《小學》：一種儒家式的基礎教育綱要。**清華教育學報**，**38(1)**，1-41。
- Becker, C. H., Falski, M., Langevin, P., & Tawney, R. H. (1932). *The reorganis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Paris: The League of Nations' Institute of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 Hsu, S. & Wu, Y.-Y., eds (2015). *Education as cultiv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Singapore: Springer.
- Li, K. (2021).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betwe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China*.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